

主、科学思想传播,反对专制政体,提倡并致力于教育、办报等文化传播活动,试图以西方学术、文化来改造中国。但是,容闳由于中学功底较浅,又长时期寓居美国,因而他的主张有较大局限性,比如全盘西化、输入美国的社会模式等,就与中国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严复与容闳不同的是,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所以,他的主张能上升到学理层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不像容闳以美国为样板改造中国。在这一比较中同样可以看出,相同文化背景下的受传者由于自身文化功底、学养、旨趣的不同,因而对域外文化的感知和接受效果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19世纪末,中国最早的一批女留学生也值得一提。尽管她们留学的专业是医学,回国后也主要以行医为业,但是,她们创办的医院患者如云,对西医的推广和女医生、女护士的培养等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甲午战前,在留学风气未开,女留学生寥若晨星的年代,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这4位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事业的成功,无疑予维新变法以降倡导女学的新潮以较大影响^①。当时的《申报》曾将她们誉为“奇女子”,梁启超撰文《记江西康女士》,对康爱德的留学成就给予高度赞扬。舆论关于这一事件的传播,对1898年之后的女子出国留学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早期女留学生得以出行的特殊性。以康爱德、石美玉为例,她们的留学皆与教会有关。1873年出生在江西九江的康爱德,因“幼失怙恃”,遂“被美国传教士昊格收养”^②。少年时曾在教

① 褚季能:《甲午战前的四位女留学生》,《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

②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20~21页。

会学校读书，后随昊格赴美留学。与康爱德同岁的湖北人石美玉，就幸运得多。她出生在一个教士家庭，父母都为神职人员，从小入教会学校，后被美国传教士带往美国读书。这种历史的偶然性显然不能昭示 19 世纪末叶中国人留学的整体状况，留学的落后、迟缓以及大部分留学生归国后未被重用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甲午战后，中国的对外留学出现了新的转向，这就是所谓的近代留日潮。

一般论著都以为 1896 年 6 月唐宝锷等 13 人赴日留学是中国官派留日生的开始^①。但桑兵认为，“中国人留学日本是维新浪潮推动的产物”，因而近代中国学生留日发端在 1898 年，唐宝锷等 13 人的东渡，不是甲午战争直接刺激的结果。如果忽视了历史细节，“把战后的一切变化都与此直接联系起来，看不到在警醒与学习敌手之间还有一个转变过程”^②，就未免失之简单和笼统。我以为这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论断。这 13 人东渡起初进入学习的学校，仍然是清政府于 1882 年设立的驻日使馆东文学堂，只不过“略加变通”^③而已，但其为使馆培养翻译人才的目的，学堂、学生与使馆的隶属关系，与甲午战前相比并无多大变化。提出这一点，旨在说明清末留日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它标志着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向。甲午战败，国人在羞愤中同仇敌忾，朝野上下一片联俄拒倭的呼声，因此，“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学

① 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 22 页；马小红：《本世纪初的留学日本热》，《读书》2000 年第 4 期。

②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 139～143 页。

③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 139～143 页。

习日本的口号”^①。所以,这 13 人东渡只不过是战前创办的东文学校这一培养使馆译才的继续。

维新变法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政治制度为突破口的一次社会变革,因此,大力倡导政治、法政、社会等学理的传播与输入。所以,梁启超有“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中国对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②的言论,这是较早提出向日本学习的主张。1897 年,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提出以日本为变法自强的榜样。1898 年,张之洞著《劝学篇》云: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③

不久,中日关系由于俄、德加紧对中国的瓜分而日益缓和,于是随着对甲午战败的深层次反思,维新人士及趋新官员倡导向日本学习。与此同时,潜伏在日本政界的试图培养亲日派的图谋蠢蠢欲动,也要求中国派留学生赴日留学。1898 年 5 月,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认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的帝国,

①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 139~143 页。

②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 934~936 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第 974~975 页。

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①。矢野文雄从军事、经济、政治等许多方面阐述了培植亲日势力对“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②的作用。这一阴谋果然就在40年后侵华战争中的何应钦、汪精卫等政要身上应验（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于是，官派留日学生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维新变法的国策之一正式启动。1898年3月起，杨荫杭、雷奋、杨廷栋、富士英等来自南北洋、湖北、浙江等地的官派生共64人赴日留学，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官派留日学生。同年，毕永年、冯斯栾等13名自费生赴日。留日学生队伍的逐渐壮大是在1903年之后。据统计，1902年，留日学生只有400人^③，1903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的题名录统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642人^④。1906年，在日的中国留学生13000多人。至1912年，中国赴日的留学生共达30000人^⑤。所以才有人说，在20世纪初的转折时期，日本的东京、横滨等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涌向这里，使之“成为正在兴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的时代”^⑥。

① 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第8页。

② 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第8页。

③ 《日本留学生调查录》，《选报》第10期，1902年3月20日。

④ 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第174页。

⑤ 马小红：《本世纪初的留学日本热》，《读书》2000年第4期。

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5～110页，东京，1960年。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统计一览表^①(表六)

年 份	人 数(人)
1896	13
1898	61
1901	274
1902	608
1903	1300
1904	2400
1905	8000
1906	12000
1907	10000
1909	3000
1912	1400

很明显,正文和列表中的留日生统计数字不太一致。这是因为除官费生外,自费生占到了将近一半,而官方资料未能给予准确反映。同时,来自各社会团体的统计也不完整,因而留日生的入数便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列举一些数字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留日潮的涨落和当时留学潮的发展趋势。

这一次的留日潮,就其发生的背景而言与此前的留学潮不同。早期派遣学生留学欧美,是为了输入西方发达的技术,限于制造、驾驶、电气、矿冶等实用之术,目的是发展洋务,自强救国。留日潮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关注的是日本的社会、政

①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文史哲》1982年第3期;《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治的改造,所以留学重点从制造、驾驶转向了师范、政教。留日生数量逐年骤增的潜在原因,是辛丑之后清政府为挽救危局而实行的“新政”需要。许以官职给留学归来者,无异于给废除科举后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一条留学做官的途径;同时,出国留学也是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主要渠道之一。梁启超说:“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① 旅日生在《游学译编》第6期刊登《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方针”。在这一留学救国的社会思潮驱动下,中国留学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观。赴日留学者主要以20岁左右的青年为主,“但也有六七十岁的老翁,十来岁的幼童。还有行路艰难的缠足女子,有一定名望的举人、秀才、进士。有的则夫妇、父子、兄妹一同留学”,“甚至出现全家留学、全族留学的情形”^②。救亡思潮下的留学主题,主要是针对军事、法政、文学、外交、教育等社会科学的学习,遂掀起了一股广泛利用报刊、出版、社团来传播域外文明的热潮。据统计,这一时期由留日生创办的报刊大约有近80家。既有政党报刊,也有同乡会的同人报刊和纯学术刊物,广泛传播了以西方民主、自由学说为主体的域外文明,酝酿和发动了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从这一点来说,日本是近代中国社会救亡思潮产生的策源地之一。

随着民主思潮的勃兴,文学革命的思想先后由留日生倡导而兴起。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26页。

小说》等报刊,在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下,他提倡“新国民”的政治小说,并从欧美、日本诸国开化的历程中窥见了文学的作用,因而抬高了小说的地位,把它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清末的“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就是留日学生文化传播的结果。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实践者,他曾留学日本并担任驻日公使,深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和影响。1906年,留日生成立的戏剧团体——“春柳社”,在日本公演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话剧,使话剧经日本传入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新文学的创作者中留日生不胜枚举,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都在日本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深深打上了日本文化和日译西方文学著作影响的痕迹。

由于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和形势,从而决定了不同的价值选择和留学生政策,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留学生文化。最早外派留学主要是为“洋务”的需要,从此,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凡派往欧美者,以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主。甲午战后掀起的留日潮因受日本明治维新的震动,所以,明显带有民族救亡的激进色彩,学习重点多集中在社会科学、军事等学科,主要是制度、心理层的借鉴、改造。由于这一特殊性的影响,留学生归国后的选择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留日生从政者多,留学欧美者多选择科技、制造、研究。这充分体现了留学生对域外文化的选择吸收和涵化的特点。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一般情况下,“留日学生中学法政、军事的要占一半”^①,这还不算经济等学科。出使大臣杨枢 1903 年正月统计,“在

^①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147 页。

日的中国学生已达 1300 多人,其中学文科的 1100 多人”^①。史载,“从 1905 到 1907 年,同盟会为数可考的会员有 379 人,其中 354 人是留学生,占 93%,而绝大多数是留日生”^②。这一系列数字都可说明一个问题:留日生大多数热中于文科学习,并且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自 1908 年开始,美国以退还部分《辛丑条约》赔款为条件,要求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这就是有名的“庚子赔款留美生”的开始。与前面的留日潮不一样的是,留美生绝大多数学习理工农医,正如竺可桢回忆的:“全部庚款留学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③ 1918 年,留美生的“人数 1124 人,学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者有 700 多人”^④。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留学救国”思潮下的留日生,“把留学和反清革命联系起来”,而民元以降的“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中的留美生,则“把留学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⑤。这一选择背后潜藏着的是不同的社会危机和时代背景。文化传播的侧重点以及主攻科目的不同,是由认识上的差异导致的。

① 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84~101 页,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吴霓:《中国人留学史话》,第 84~101 页。

③ 1960 年清华大学访问记录,参见李喜所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221 页。

④ 李喜所:《清末民初的留美学生》,《史学月刊》1984 年第 4 期。

⑤ 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 226 页。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

梳理传统教育体制的现代转型和留学制度的开启,实际上就是拷问现代知识分子形成的心路历程。从封建体制的附庸者到边缘化,“知识人”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蜕变过程。这种哀伤而没落的心境,是不能完全用科举入仕之路的被斩断来解释的。面对国破家亡的积弱和危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一边是日益衰落的传统文明,一边是殖民主义者带来的域外文明。中与西的矛盾,古与今的纠葛,撕扯着、撞击着当事人的心灵,从而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历程充满着炼狱般的煎熬。因为,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他们所竭力争取的已不仅仅是自我的解放和自由。无法回避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义无反顾地选择前驱者的角色,这就是启蒙者的命运。

下面就谈一谈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

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大致在中世纪,它是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产生的,其特定内涵是指“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①。俄国作家彼得·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一词^②,称它与人的某种

① [法]雅克·勒戈夫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② 《苏联百科词典》,第159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特殊天赋如智能、智商有关。那么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何晓明认为：

根据西方学者的一般理解，所谓的“知识分子”，除了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且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具有超越于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私利之上，深切关怀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利益的品格。^①

他们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是些专门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②。

有学者指出，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士”这一类似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百家争鸣”的历史语境看，确实出现了庄子、孟子、墨子等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人身依附关系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是某一集团、政治势力的附属与私产。“士”的自由人身和四处周游，不但使其自由学说得以产生，而且，诸侯纷争也为“士”人的自由思想提供了实践、张扬的舞台和空间。然而，随着秦汉以降的大一统政治策略的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除儒家学说之外的学术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从此，“士”便徘徊于“庙堂”与“江湖”之间，前者融入统治集团成为其一分子，彻底消融了其独立性和批判能力；后者忘情田园，在“天人合一”中体验自然，寄托理想，这就是古代“士”人的“进”与“退”。进者以统治

① 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第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② [美]水秉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倾向》，《知识分子》文丛之一《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第1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